



# 抗日战争中的台湾义勇队

台湾义勇队成立于1939年、解散于1946年，由台湾同胞组成，是抗战时期参加祖国抗日战争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台胞抗日团体。存续7年间，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使命，与祖国各地人民共同书写了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徐文彬

## 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成立

抗日爱国将领李友邦是台湾义勇队的创建者，原籍福建泉州同安县兑山村，1906年出生于台北。李友邦自幼就深具民族气节，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早年参加由蒋渭水等人组织的“台湾文化协会”，因策划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遭到日警通缉，内渡回祖国大陆。来到广州后，李友邦先就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于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数次参与台湾革命运动，并因此多次入狱。

1938年，在中共党员骆耕漠协助下，李友邦筹划成立台湾义勇队，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为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中共浙江省委派遣中共地下党员张毕来作为李友邦的助手，参与筹划义勇队的诸多事宜，还与贺绿汀共同创作《台湾义勇队队歌》，主编《台湾先锋》，张毕来在队中地位仅次于李友邦。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创办的《东南战线》，也对台湾义勇队作了全面报道，除发表《台湾义勇队之组织及其工作》《台湾义勇队队歌》等文外，还

## 从积极抗战到筹划收复台湾

以开罗会议为界，台湾义勇队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1939年2月至1943年11月。该阶段台湾义勇队主要在浙江、皖南等地抗日前线活动。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撤离到福建南平，10月，台湾义勇队将驻地转移到龙岩。此时台湾义勇队充分发挥队员所长，在金华、衢州、兰溪、建阳等地设立医疗所，派出医疗巡回队义务治疗伤员、病患。为缓解药品紧缺困难，台湾义勇队队员协助药厂，提炼樟脑油，利用国产原料，研制奎宁、胃药等战时急需药品，有效地解决了药源问题。与此同时，台湾义勇队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化装表演、街头歌咏、演讲、发传单等方式，向民众劝捐、慰劳将士，并创办《台湾先锋》等刊物，刊文揭发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罪行，鼓舞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义勇队的对敌工作也颇有成效，在翻译敌情、对敌喊话、策反敌军、审讯敌俘、情报收集等方面大显身手，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日军斗志，成为我方研判日军动向的重要媒介。

台湾义勇队的奉献精神，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如国民革命军190师师长余锦源深受感动，“他们不畏艰苦危险，更深入阵前工作，这种奋勇精神，不但把台湾的更生气象，给与吾人深刻印象，深信台湾的革命绝对成功，将使祖国同胞的抗战情绪，亦因振荡而愈

## 投身战后台湾接管与建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台湾义勇总队副队长张士德受李友邦委派，携带国旗，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校的飞机赴台。次日，在台北宾馆升起台湾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张士德到台后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的名义开展吸收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团员、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机构、任命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的工作。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正式接管台湾，在此之前，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其团员在维持台湾社会秩序、治安、战后重建，以及建设新生台湾的工作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李友邦亦在厦门积极筹划复台事宜。他大力举办干训班，考查学生思想状况，吸收进步青年参与台湾义勇队、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增强复台力量，队伍发展超过400人。因台湾接管在即，为扩展宣传工作，

刊载“福建台湾同胞和当地人民欢送台湾义勇队出发”等照片，有力地扩大了台湾义勇队影响力。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酒坊巷18号（现84号）成立，开始“预备训练”，队员共计30余名（内含少年团6名）。1940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发文，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李友邦被任命为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团长。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使命，对号召台胞积极抗日、增强两岸同胞的抗日决心起到很大的作用。旅闽台胞深刻认识到大陆与台湾唇齿相依，只有保卫住祖国大陆，台湾当时才有可能摆脱殖民统治，于是积极响应李友邦号召，纷纷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

尽管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但这并没有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血肉联系。台湾人民仍然心系祖国，渴望通过参加抗日战争光复台湾，这是李友邦创建台湾义勇队的根本原因所在，亦是台湾同胞积极参加义勇队的重要动力。

趋高涨，真值得吾人的欣慰和钦佩！”台湾义勇队颇为活跃，贡献颇巨，队伍不断扩大，1943年6月，台湾义勇队已有三个区队、九个分队，有队员184人、少年团团团员117人，共301人。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确定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形势日益明朗。收复台湾迫在眉睫，国民政府日益重视台湾义勇队，将其改称台湾义勇总队。台湾义勇队意识到“形势紧迫，任务重大，凡散处祖国各地的台湾青年，除积极参加各项抗战工作外，更应随时准备，作为收复台湾的先锋”。1944年11月，李友邦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义勇队分团第二届团员大会上号召台湾同胞：“我们在过去与现在的革命过程中，是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奋斗；而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为建设台湾、拱卫祖国而献身。”

此后，培养台籍干部，筹划收复台湾，逐渐成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重心，经费、人员均得以扩充，至1945年5月，台湾义勇队有官佐队员322人，其中官佐62人、队员260人，另有士兵59名，合计381人。此外，台湾义勇队还向重庆高层提供收复台湾方案，纠正宪法与机制上的缺失，积极训练相关人才，对于维护祖国主权、收复台湾大有裨益。

李友邦筹办《台湾新闻日报》，拟在台南、台北、台中分别出版。李友邦还于厦门五老峰山麓崖上，题写“复疆”大字，以表达他带领台湾义勇队全队战士收复疆土台湾的决心。1945年12月8日，李友邦率队员及其家属搭乘两艘客轮“胜利”“胜兴”号，返回台湾。在台湾接管过程中，李友邦在组织、动员台湾青年为建设家乡服务上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和少年团因完成收复台湾历史使命，奉令解散。

台湾义勇队是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代表，也是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是两岸人民团结御侮的历史见证。此外，追忆台湾义勇队这段历史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有力地批驳了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试图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声称台湾人民未参加祖国抗战的谬论，同时也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据《学习时报》

## 章乃器创办中国征信所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金融界正陷于一种隐忧：各大银行向外放贷，因缺乏对工商企业信用的科学调查，全凭“跑街”口耳相传，导致呆账坏账层出。资深银行家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专业的信用调查机构，为银行业护航。

这一重任，落到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肩上。年轻的章乃器素有才干，他深知旧有调查方式主观散漫，决心以科学方法扭转局面。历经多方筹备，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独立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在沪宣告成立。

征信所采取会员制，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20家重要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组建。章乃器被推举为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征信所系统地调查企业及个人的资产、信誉、经营状况，整理成专业报告供会员银行参考，极大提升了贷款决策的可靠性。

此后数年，中国征信所迅速崛起。它不仅出版了极具权威的《征信行名录》，取代了英商把持数十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更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成为全国独占的信用调查事业。这一切，让中国金融界扬眉吐气。

然而，风云骤变。因章乃器积极参与救国运动，当局向银行施压。1936年，他毅然辞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同时也不得不离开他倾注心血的中国征信所。尽管这一开创性机构已成为金融界不可或缺或支柱，尽管董事长的地位比银行职位更具影响力，但章乃器却毫不犹豫。他后来淡然回忆：“在那连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的高昂情绪下，丢了一个银行的金饭碗……能算什么呢？”

4年光阴，章乃器以一己之智、一片赤诚，为中国现代金融信用体系奠定了基础。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 邹韬奋回读者来信

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自1926年接办以来，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处理读者来信。从最初的日均40封，到后来的日收千封，来信数量的激增见证着这份刊物与读者日益紧密的联系。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

1932年冬季的一个深夜，在上海福州路生活书店二楼办公室里，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信是一位失业青年写来的，字里行间满是绝望：“我是去年八月失业的……在这个被少数特殊人所占有的现社会里，我们这样的一群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呵！”邹韬奋立即提笔，这封信，他不仅要回复，还决定刊登在“读者信箱”栏目，让更多人听到民众的呼声。

另一封是一位名叫吴晓晨的青年写来的，诉说着教育与职业不能两全的困境：“因社会经济的衰落，生活程度的提高，子弟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困难……”邹韬奋沉思片刻，开始了长达两三千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社会制度根本改造。另一种方式就是先迁就环境，尽可能先入学，入学不成就只有寻业。”

邹韬奋深知每一封来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着各自的苦衷。正如他所说：“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十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达4万多封，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让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让每一份苦难都能得到回应。 时小明 据《人民政协报》